

幸福的感覺



如是我見
楊不秋

大約十年前，我還需要經常出差。重慶，是幾乎每個月都要飛去的地方。我最記得的是重慶人很自豪地對我說：我們雖然比不上北上廣，卻是一座幸福感很高的城市，而且感覺好得實實在在；

幸福感就是重慶的軟實力。現在說來或許司空見慣，可當時我第一次聽到用幸福感去衡量一座城市，新鮮得不得了。

想來，沒有人會對「幸福」一詞陌生；恐怕還會因為太平常而少去思考到底什麼是幸福。我問起身邊的朋友，他們的反應大多訝異又表示好難答。在我的堅持下，他們還是給出了五花八門但每一條都讓我看得心生暖意的回答：

「幸福就是內心的安定；不過慮，不迷茫，能感受小快樂，能扛住大悲傷。」

「吃得好，睡得好，心情舒暢。」

「春天喝到的一碗醃篤鮮，再加上一條清蒸刀魚和一碟酒香草頭。」

「充實，有自己的空間和興趣，有能力

關愛和幫助他人。」

「家庭美滿，愛滿滿。」

「可以想幹嘛就幹嘛。」

「一家人歡樂平安。」

另外，兩個互不相識的朋友不約而同地說：「幸福就是好好活着。」還有一位：「幸福就是沒有不幸。」這樣的回答不甜也不暖，卻讓人覺得挺務實的。

作家馮唐曾經問導師幸福是什麼？導師說：人的幸福是由兩件事構成的，第一是自己擅長而且喜歡的事，第二是和自己喜歡而且喜歡自己的人在一起。

每個人都有自己對幸福的定義和理解，可以千差萬別。心理學有種說法，將幸福解釋成能夠產生內心愉悅感的心流。想一下，這個概括還是蠻好的。

其實，香港也是一座先天條件優秀的城市。或者是我「濾鏡大開」，香港確實十分難得地融合了現代化和大自然的相鄰共生。先進的城市基建，良好的氣候條件，美麗的城市海濱，廣袤的郊野公園，多彩的文化生活，繽紛的國際美食，把這麼多亮點集於一身的城市很不多見。不過，為什麼大家提起

香港，首先想起的還是各種壓力和逼仄緊迫，幸福感卻好像遠遠得在天上飄啊飄。

我想，這大概還要歸因於城中人的心態。我認識的香港人大都拚搏勤勉，捨不得讓自己停下來。不止一個香港朋友告訴我，如果看到日程表上稍有空閒，就會心生焦慮。忙碌對他們而言，也許未必幸福，但至少不會空虛和內疚。所以，香港並不缺乏幸福感，只是內心恬淡且願意停下來感受幸福的人可能並不多。

我理解的幸福，是在預期和現實之間平衡後的自我和解與滿足。而平衡當然不是時刻都能保持的常態。所以，生活中要麼是在幸福的當下，要麼是在努力朝幸福奔跑中。

願各位，辛勞着的，安逸着的，都能明白自己的幸福是什麼，然後去靠近去實現。

石牆樹

香港山多地少，不少建築物需要興建在斜坡上，為了預防滑坡危險，所以興建擋土牆。這些石牆縫隙往往成為了榕樹生長的有利環境，位於堅尼地城科士街的石牆已有逾百年歷史，一棵棵細葉榕樹在石牆的縫隙生長，非常壯觀。這個既城市亦森林的奇景，人稱石牆樹。

圖、文：遂初



市井萬象

文化的質與量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香港經常出現「文化沙漠」這四個字。文化沙漠即是說香港沒有什麼文化，所以是一片文化沙漠。事實上，香港當然不是文化沙漠，那麼怎樣才能夠精準形容香港文化的狀態呢？這才是一個值得研究和討論的問題，而並不是形式主義地去找一些詞彙去形容。

另一個香港經常談論的就是「質與量」的問題，例如政府經常強調香港書展人數，貿發局強調書展有百萬人次入場，但是香港書展若果從「質」去分析，它近似一個散貨場式的書展，不是一個推動印刷出版業發展的書展。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是一個以質為本的書展，它是帶動出版交易、出版創新以及出版貿易的一個書展和平台。台北的書展也有類似的走向，簡體字出版及繁體字出版，也有它的一個出版生態和版權交易生態。

香港書展近似一個低端的散貨場式書展，它沒有推動整體的閱讀質素提升。推動整體的閱讀風氣需要圖書館，那麼香港圖書館的數量和質素又如何呢？目前書藏的狀態又如何呢？香港圖書館政策基本三十年來從沒有改變和改善過。那麼這是質的問題？還是量的問題呢？

西九管理局強調M+博物館已經有一百四十萬人參與。一百四十萬人的量裏面，令香港有什麼質的變化呢？是否令整個香港社會對文化藝術更加

有感情？更加喜愛？願意支持文化藝術呢？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有四十萬參觀者，這四十萬參觀者如何去分析？有多少是年輕人？年齡層如何？教育程度如何？職業收入如何？它對社會產生怎樣質的效應才是重點。文化是質的問題，不是量的問題。因為要改變質，量會隨質產生變化，才是文化政策的本質，就是如何能令大眾改變他們對文化的價值觀。香港需要做的是令「量」變「質」，而不只是加強「量」的數量，要令「量」有質的變化，才是重點。

上世紀九十年代，台灣的歷史博物館經常主辦不同類型、有系統性的展覽，由埃及古文化、印象主義繪畫、瑪雅文明，有一個系列，以半年為單位，展覽的面積既大也有質素。而最重要的是所有台灣的小學生均要參觀這些展覽，這個就帶來台灣量與質的變化，台灣社會走向對文化藝術有感情有興趣，也是這個原因。

近年上海北京也有類似的情況，就是在博物館的質有提升、展覽質素也有提升。核心的是他們在策展方面已經培養起自己的策展團隊。香港在這方面基本上沒有太多質的變化，經常只強調量，人多參加，但是整個香港社會的文化素養和質素是否有提升？經常沒有具體的分析和研究。這便是香港未來文化發展應該要重視的地方：如何令量產生質的變化。

無聲的老調子建築



流動空間
方元

魯迅雖然沒寫過建築評論，但他講過建築對他的影響，例如三味書屋、雷峰塔等等。在香港，與魯迅有緣的是一座紅磚建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它於一九一八年建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和十九日，魯迅在這裏發表了兩篇講演，第一篇是《無聲的中國》，第二篇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因此我把青年會大樓叫作「無聲的老調子建築」。

誰是建築師

青年會大樓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因此簡稱「必街會所」。它的歷史意義，除了魯迅之外，建築師也是一個加分項。人們曾長期認為必街會所是由香港建築師設計的，但實際上，設計者來自美國，名叫哈利·赫西（Harry Hussey）。他是加拿大人，在美國執業，是芝加哥一家建築事務所的合夥人，專門為青年會設計會所。因此，香港這座會所表現了美國建築的形式和風格。

許多人都會問：為何青年會捨近求遠，不用香港的建築師，而去芝加哥請人來設計？簡單地說，這是因為赫西是基督教青年會負責亞洲區的建築師。他並非對中國一無所知，坐在美國開門造車。在做香港的工程之前，他已來到中國，設計過天津的青年會大樓。香港這個工程則是香港的英籍建築事務所協助他完成的。

赫西在中國設計過不少建築，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協和醫院。實際上，香港的史學界和建築界一直低估了赫西。倘若發現必街會所與北京協和醫院的設計者是同一個人，那麼古蹟辦事處對赫西和必街會所可能會做出新的評價，會更積極地考慮把它列入法定古蹟名單。

其實，香港與北京的工程幾乎是同時進行的。赫西在一九一五年接到青年會的設計委託，第二年他就收到協和醫院的設計委託書。當必街會所施工的時候，他沒在香港，而是站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工地上。顯然，由於北京的工程比香港的規模大十幾倍，施工更複雜，困難也更多，因此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北京。

雖然必街會所與協和醫院是同期的建築，但在藝術形式上兩者有顯著的差別。北京協和醫院於一九二一年建成。它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一個早期的代表作，早過美國建築師茂飛（Henry Murphy）設計的燕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校園）。在生意上、事業上以及建築藝術上，赫西與茂飛有過「瑜亮之爭」。

誰是邀請人

最近我去必街會所時，在門廳的展板上看到一句話：一九二七年魯迅「應香港大學和青年會邀請到本會所講演」。這個說法準確嗎？

一九二七年初，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系主任。如果港大邀請魯迅赴港，按理說應由中文系發函。不過，當時港大尚未成立中文系，只有一個作為選修的漢文科。魯迅在《略談香港》一文中提到，他回廣州後在六月二十八日的《循環日報》上看到港大要成立「華文系」的消息。這說明他與港大沒有直接的交流和聯繫。

當時港大漢文科的掌門人是前清翰林院的兩位太史：賴際熙和區大典。為了抗衡「五四」以來的新文化，他們呼籲重振舊道德和國粹，並在中文教育上大力推行讀經尊孔。身兼港大校監的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則是這些衛道士的最大贊助者。他們都屬於魯迅斥責的那種「唱老調子」的人，因此定然不會邀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來港講演。

當年是誰邀請魯迅訪港？這在史學界長期是一個謎。最近幾年，國內外學者經過反覆論證後認為，邀請魯迅訪港的人應是趙今聲和葉少泉。前者當年是港大土木工程系的畢業生和香港《大公報》的兼職編輯。後者是廣州國民黨青年部的交通

員，經常來往穗港兩地，並認識魯迅。趙葉兩人是河北同鄉。趙今聲後來成為著名的港口工程專家，曾擔任天津大學的副校長和天津市政協的副主席。

一九九一年，趙今聲教授在寫《八十八歲自述》時談到魯迅訪港的經過，無意中為史學界揭開了謎底。根據他的回憶，當年他與葉少泉邀請魯迅訪港，是自發的、出於愛國熱忱的個人行為。葉負責邀請和陪同魯迅來港，趙則負責在港的接待事宜及擔負交通和食宿費用。在報社的默許下，趙今聲以《大公報》的名義發邀請函。他將魯迅安排住在必街會所，並獲得青年會的同意，免費使用禮堂。由此可見，香港大學在這件事上並無角色。報社和青年會雖然為魯迅訪港給予便利，但都不是真正的邀請人。

誰的紀念館

為誰建紀念館，這不是建築技術的問題，而是文化政策的問題。倘若必街會所是在廣州或其他內地城市，它很可能會被改建成魯迅紀念館。作為現代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在內地備受崇敬，凡是他生活過的地方都建有魯迅紀念館或雕像，例如北京、上海、南京、紹興、廈門、廣州等地。在日本也有魯迅的紀念碑和雕像，例如魯迅留學的仙台市東北大學以及魯迅的老師藤野的家鄉廈門。

然而在香港，魯迅的足跡幾乎是隱形的。這並非因為香港低估了魯迅，反而是當年港英政府對他「重視」的結果。他們深知魯迅的戰鬥力，因而將他放入歷史的冷庫，盡量消除他的影響。如今，我們應當把這段被冷藏的歷史拿出來解凍、解殖。

那麼，有可能把必街會所改建成魯迅紀念館嗎？一個可借鑒的成功實例就在一街之隔的孫中山紀念館。它原是富商的住宅，後被教會買下用作會所。二〇〇四年，政府從教會手中購得物業，將它改建為紀念館。所以，事在人為。如果不去做，那就永遠只是「可能」。最近，特首提到要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魯迅與必街會所即是一個有待重新挖掘的、有歷史意義的好故事。



紀念魯迅在香港必街會所發表講演九十五周年。 作者繪

尊之小考(三)

閒話煙雨
白頭翁



見到「婦好鴛尊」者，無不為之一震。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一尊，此尊非彼尊，此尊亦鳥尊，卻是一隻鴉，昂首直立的鴉，器宇軒昂的鴉。兩足駐立，雙翅收緊，高冠卷喙，以尾駐地，一隻威風大氣的鴉。再細看這隻鴉尊，冠部飾以夔紋，喙及胸部飾以蟬紋，尾部上方飾有一張翼的正面鴉紋。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一隻美麗可愛，威武俊俏的貓頭鷹。商代的青銅文化堪稱是世界青銅文化的巔峰。

在山東壽張出土的「小臣餘犀尊」，一隻令人喜從心來的小犀牛，憨憨的、萌萌的，挺着兩隻不高不大的犀牛角；笨笨的、胖胖的，兩隻眼睛卻瞪得圓圓的，神采奕奕，圓滾滾的肚子，粗壯的四肢，直立的兩耳，半啟半閉的「小嘴」，栩栩如生；背上

有裝酒的進孔，不忘尊之使命。

西周早期時的何尊，是青銅器尊中的「尊寶」，因為它是世界上青銅器尊中唯一一個留下周成王營建「成周」的文字紀實。周成王五年，新都城建成，周成王遷都於此，並在天室為其父周武王舉行了隆重的祭禮。對有功之臣進行了嘉獎，賞賜給一位名何的貴族三十串貝幣，這位名何的功臣貴族倍感榮耀，專為此鑄造一尊青銅尊，在尊內底鑄銘文以祭祀他的家族和紀念周成王的恩德。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的歷史價值尚不止於此，「為器雖小，而在禮寶大。」在這篇一百二十二字的銘文中有四個字引起學術界和歷史學家的極大關注，這就是：「宅茲中國」。「中國」究竟在何時開始有了「中國」的稱呼？自宋代之後一千多年來，就有大批學者、專

家在孜孜不倦地刻苦追求，但卻苦於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而在何尊的尊底銘文中準確無誤地記載着「宅茲中國」，這是對「中國」最古老、最真實的歷史見證。

誠然，何尊當時記載的「中國」只是指伊洛地區，以後隨着時代的發展，逐漸演變為把華夏民族居住地和建立的國家命名為「中國」，這使何尊備受關注。

一九七六年，我國文物部門組織一批文物赴美國參加展覽，美國方面直接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參展的文物中一定要包括何尊在內，美國方面可為何尊提供三千萬美元的保險費用，這張保單在當年已是讓人瞠目結舌的天文數字。何尊現在已屬於國家規定的不允許出國出境的國家文物，再大的保單也不會讓何尊跨出國門一步。國寶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閃失。

何尊不凡。何尊的四周有四道大扉棱裝飾，似乎想為何尊插上羽翼，尊口沿下鑄有凸雕的蕉葉紋，尊頸處飾紋變為夔紋。何尊圓口方體，高三十九厘米，口徑二十九點六厘米，重達十四點六公斤，何尊通體飾有高浮雕卷角饕餮紋，一眼望上去，有些猙獰沉重，光怪陸離，不能不佩服三千年前古人的藝術構思。

何尊要近看細看，靜看慢看，每一道飾紋都有故事，每一組浮雕都有內涵，且鑄造得天衣無縫，渾然一體，莊重大氣，凝練粗獷。

何尊亦為歷史見證人，它證明了歷史，彰昭了歷史；解答了歷史上三千年懸而未解的歷史疑案、懸案，再次證明青銅酒器中的尊，更是青銅器中的禮器、祭器，何尊為上尊。